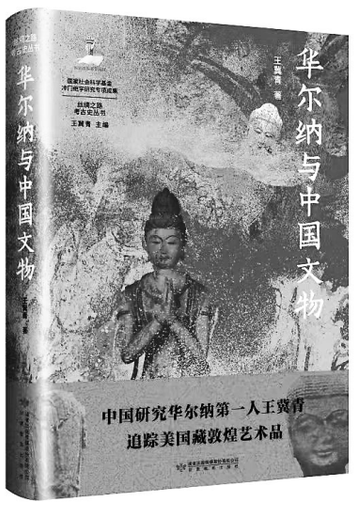
甘版图书

华尔纳与中国文物

□ 董宏强

在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痛史中,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王冀青教授新著《华尔纳与中国文物》,作为“丝绸之路考古史丛书”的重要一册,以翔实的档案史料、多维度的学术视角,系统梳理了华尔纳与中国文物的复杂关系,揭示了20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下文物命运的沉浮。



专家为楼兰古城遗址建数字化档案。新华社发

一

长期以来,华尔纳的敦煌盗劫行为虽广为人知,但国内学界对其两次考察的细节、动机及后续影响的研究始终缺乏系统性。过往讨论多集中于其剥离敦煌壁画的破坏性,而对华尔纳的学术背景、美国博物馆的收藏机制、文物被盗和被所谓“拯救”,以及文物被肆意劫掠大量外流引发的深入思考等鲜有深入剖析。《华尔纳与中国文物》首次整合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档案、华尔纳私人信件、中国地方志文献及国际学术界的相关成果,构建起一幅完整的“华尔纳与中国文物”图景。

书中详细考证了华尔纳两次中国西北考察的全过程:1923年首次盗取敦煌壁画与唐代彩塑,1925年试图大规模剥离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失败经历。作者不仅还原了华尔纳使用化学胶水剥离壁画的细节,更揭示了其背后的学术野心——通过实验室分析唐代颜料成分,构建东方艺术史的“科学话语权”。这种将掠夺行为与学术研究交织的双重性,恰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学术的典型特征。

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事件叙述,而是深入剖析了华尔纳行为的结构性动因。这种多维度的分析,使得本书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批判。

二

作为深耕丝绸之路考古史数十年的学者,王冀青在史料挖掘上展现了非凡功力。书中揭示了美国博物馆之间瓜分中国文物的隐秘动机和手段。例如1925年第二次考察时,华尔纳遭遇抵制的挫败经历,正是通过北京大学教授陈万里的《西行日记》与地方档案的互证得以完整呈现。尤为珍贵的是,作者将华尔纳的著作《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1926年)与《万佛峡》(1938年)首次纳入中文世界的学术视野。通过对比华尔纳的自我叙事与中国学者的记录,作者表达了鲜明的观点:华尔纳的游记刻意淡化了盗劫行为的暴力性,转而将自身塑造为“东方艺术的拯救者”。这种文本的解构,揭示了殖民主义话语如何通过文学修辞美化掠夺行径。

三

本书的深层价值,在于将华尔纳事件置于20世纪初中西文明碰撞的宏大语境中。一方面,华尔纳的“科学考察”本质上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延伸:他以哈佛实验室为工具,将敦煌壁画从文化整体中割裂为“可分析的样本”。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的反应——从北京大学组建监视团队到甘肃民众自发守护洞窟——标志着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掠夺与抵抗”的张力,成为近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的重要转折点。

作者的创作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全书末章,结合档案研究,作者引导读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如何评价华尔纳等“盗宝者”的历史角色?西方博物馆以“保护”之名持有中国文物是否具有合法性?同时也郑重提醒读者,更应该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近现代西方各国的中亚考察家所撰游记,不能被书中的观点和情绪所左右,致使误入歧途,这也进一步引导读者深入思考文化遗产主权与人类共同遗产的辩证关系。

四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华尔纳与中国文物》在写作上兼具史学深度与文学感染力。作者从华尔纳初涉中亚考古活动讲起,以华尔纳两次考察为明线,以极其丰富的档案资料和考古资料为支撑,叙议结合,层层剥开华尔纳执着于中亚考古、剥移敦煌壁画的经过、盗窃金塔佛像案等历史谜团。尤其涉及华尔纳与家人、斯坦因等人的大量通信,分明是华尔纳在向读者诉说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使得学术考证充满文学叙事的场景张力。

此外,书中大量插入的档案图片,不仅增强了内容的实证性,更让读者直观感受到文物流失的物理轨迹。这种图文互证的手法,展现了作者作为史学家的严谨与出版人的匠心。作者语言表达非常考究,用词平实,文字驾驭能力极强,流畅自然,尤其对复杂事件的叙述条理清晰,顺叙、倒叙、插叙信手拈来。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增强了内容的画面感,夹叙夹议,又提升了内容的可读性、趣味性。

总之,《华尔纳与中国文物》是一部充满思辨力量的学术作品。它既是对一段文化劫难的血泪记录,也是对文明对话机制的深刻反思。

(《华尔纳与中国文物》,王冀青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游客在敦煌市博物馆参观。张晓亮

在文字里重逢生命的春天

□ 徐静

细雨纷纷的时节,捧读一卷《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在文字的原野上郊游,于生死的思索中重逢生命的春天。

这部散文集收录了史铁生、汪曾祺、梁实秋、丰子恺、沈从文等12位文坛大家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笔触纵横,将爱情、友情、亲情、勇气与真诚等诸多生命主题娓娓道来。它不仅是对人间真情的礼赞,更是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辨,引领我们在希望的浪潮中,触摸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阅读史铁生的作品,就会想起那个在地坛寻找儿子的母亲,那个临终前仍念叨“要好好活”的母亲,她的爱像春天的细雨,浸润着史铁生的每一天。当史铁生在轮椅上用文字重构生命的意义时,他完成了对母亲遗愿的无声回应。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这种跨越生死的精神传承,像春天的种子破土而出,生生不息。

萧红《祖父的园子》里,那个与倭瓜花、黄瓜花为伴的小女孩,在祖父离世后骤然跌入命运的冰窟。正如春天的蒲公英,被风吹散后仍能在新的土壤扎根,她在苦难中淬炼出的文字,成为照亮无数人生命的灯塔。这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是对生命最崇高的致敬——当我们在苦难中选择热爱,生命便有了超越死亡的力量。

丰子恺借水仙历经三次摧折仍顽强绽放和重生的经历,传递生命的真谛:世间诸事皆同,只要生机尚在,烟火未灭,即便遭遇千难万险,也终有拨云见日之时。不放弃,生活终会柳暗花明。他用质朴的文字勾勒出生命的本真,让读者不知不觉沉浸其中:生命的意义不一定要完美无缺、气势凌人,也可如春天的柳枝柔软坚韧、抽枝发芽,在岁岁枯荣中,默默地书写属于自己的永恒。

在这本散文集中,作家们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他们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翻阅此书,犹如澄澈的镜面不断切换,带我们领略一处又一处的人间烟火,给予我们质朴而深刻的生命启迪。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众生百态,感受不同的生命在不同的时空与境遇中,努力绽放光芒。

正如扉页所言:“我们生而破碎,用活着来修修补补。”这种修补,是史铁生在地坛的沉思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是萧红在异乡的笔耕中对抗命运的不公,是丰子恺在对残花的凝视中领悟生命的顽强,更是每个普通人在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执着。这修补的过程,恰恰是生命最动人的写照和模样。

“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这句灵动而富有哲思的诗句表达的是,人这一生需历经无数风雨和艰难困苦,方能真切体悟到生命的珍贵。珍惜那些陪伴我们一路走来的岁月与经历,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意义。闭眼听风,在风中感悟人间真理及生命的意义。

(《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史铁生等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评

掌故家的“以小见大”

□ 杨善之

我读掌故适在闲暇之时,每有一卷在握,终至不忍释手,轻松看着别人的故事,风云际会,遭遇跌宕,免不了要替古人担忧。掌故不仅仅是写一点轶闻,也需要文字的趣味,旧时文人所写笔记,大多才华满卷,灯下走笔,令人掩卷低回。最早读到黄裳郑逸梅写旧友故人,感觉文章别致,可圈可点,可叹可悲。吴承恩蒲松龄纪晓岚写狐写鬼,似乎都比写人更有名,也是颇得大众喜爱。直到后来,那些文法似乎不大能够赢得读者,遂至式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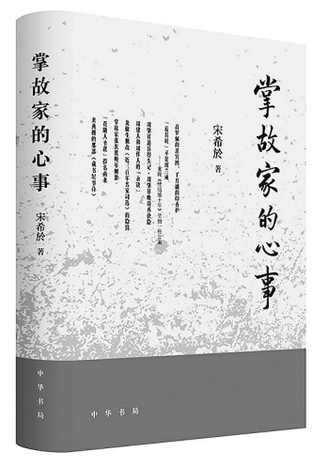
前些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我都尽量收集来读,这或者也是掌故的一端。《明皇杂录》记杜甫事:“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颇为县令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这些杂录、补遗、轶闻、小史,读来算是今天所说掌故,但词典里说掌故为“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与我们今天读到的文章相去甚远,也很是冷漠寡淡,似乎只有到了文人这里,才称为掌故也就趣味多了。

但白头宫女说玄宗,也未必件件属实,读《掌故家的心事》很令人感慨,到底谁是掌故家也颇为疑惑,书中有一则《掌故家张次溪晚年侧影》可释疑。不过爱写掌故的文章未必都好,清末民初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也多写此类文章,周瘦鹃写《云裳碎锦录》《唐瑛女士访问记》等文,琐细无聊,格调不高,可见世风转变,时过境迁,回看掌故家也见高低之分。

《掌故家的心事》既为掌故也为考据,作者宋希於结集往年所写掌故小考,勘定校正过往旧事,文辞平实,含蓄如述,因有考据在佐,起笔便扣人心弦,细节一一展开,待引人入胜,复结论捧出,终使人长舒胸中郁气,悬疑得解。

书中《周肇祥退谷得失记》与《周肇祥晚境再抉隐》二篇,几可当作退谷老人晚年史话,作者低语慢述,读者浮想联翩。前述《掌故家张次溪晚年侧影》,亦可见到“余盛气自豪”又“迭经忧患,而壮志不磨”者,终于在现实生活中“雄心皆消除”,这位东莞人志在研究整理旧都风物史料,编辑《北平史迹丛书》《京津风土丛书》《燕都风土丛书》《中国史迹风土丛书》颇为大观,在《拟编北京历史风物资料说明》中的《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等,我在20世纪80年代购买多册,今日读到宋希於考证文章里凡此种种,不免要心怀感谢。黄裳信周汝昌所言“张次老颇不理于人口”的个性,是怀才文人的通习,不辩解不纷争。我对此颇为称赏率性而为,毁誉由人。考据掌故或多是些小事,却总能够以小见大,点笔人生。

(《掌故家的心事》,宋希於著,中华书局出版)



纸上书店

《诗词中国》

王蒙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精选二百余首中国经典古诗词,以诗化、散文化的文学语言解诗论词。作者以丰富的阅历、宽阔的想象、饱满的激情,对诗境、诗意、诗趣等进行解读。书中还介绍了相关诗人词人的创作特点,并配有30余幅古典名画,生动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学海漂流记》

王东京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成长”的书,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从“读书智慧”“学问之道”“文无定法”等方面谈论所思所想,如怎样读经典与读闲书;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灵感;怎样写文章具有才、情、趣等,帮助读者突破成长瓶颈、实现自我超越。

滴水藏海

清风吟

□ 鲁浩

有人曾以“花托翠雨”上联求对下联,经多方考究,大家公认“竹引清风”四字作对较为工整、贴切。这也使人联想到郑板桥脍炙人口的一句诗:“画石存岳意,画竹引清风。”竹引清风,作为一种自然意境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文化生活。

有句话说得好:“对文化的爱,归根结底是对生活的热爱。”反之,对生活的热爱只有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才有力量与价值。纵览古代先贤,苏东坡对清风一词的赞咏可谓达到了一个高远境界,他在《前赤壁赋》中引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他在《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中吟道:“一枕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情由心生,因为在其心目中,清风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一种辽阔、豁达的心境。

清风后来被世人引申为持守清白、不占不贪的高洁情操。元代诗人陈基以“两袖清风身欲飘,杖藜随月步长桥”,抒发荣辱皆忘、自在逍遥的心境;元代魏初以“交亲零落鬓如丝,两袖秋风一束诗”抒发青春无限好、淡泊名与利的情怀;明代况钟以“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抒发追求自然高雅、清贫质朴的志向。

“两袖清风”原指两袖迎风而起,飘飘扬扬的姿态,后多用于比喻做官清正廉洁,衣袖中除清风之外,别无他物,据说这个成语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与明代于谦有着直接关系。史载,明朝正统年间,有宦官以权谋私,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作为巡抚的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但是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麻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带有清风!”并作“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入京》诗一首,以示对那些阿谀奉承之人的嘲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孔子家语·在厄》有言:“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由此可见,对于品德高尚的人而言,清风不是外来之物,而是由其心境所生。

初日将临山气朗,清风暂至水文生。庄子在《逍遥游》中说:“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北魏郦道元有言:“西四十里有风山,上有穴如轮,风气萧瑟,习常不止。”《说文》中有句话说:“干热之气,散而为风。”

可见,“风”和“气”在古人眼中本为一体,“气”又来源于“风”。从更深的思想层面理解,正气依靠清风而存,清风实为正气之根。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他解释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世人修炼立身德行,就要引清风养正气,宁可清贫而不作浊富,宁为兰摧玉折而不作萧敷艾荣,始终“砥才明操以取贵”。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年4月11日)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电话联系,以便我们为您付酬。